

让劳工说自己的故事

何春蕤

我们常常听人说，好的文学就是要描写人性，也就是要描写最基本的、人类共有的经验与感受（如亲情爱情生老病死等等）。

可是，即使在这些看来相似的经历上，我们却往往因为社会位置不同，可运用的资源不均，因而别人对待我们态度不同，结果发展出极为差异的经验与感受。

比方说，就一个事业辉煌腾达的人而言，他对人生充满乐观的看法，他有信心可以为孩子提供优异的成长环境，他享受着周围人的羡慕，住在不愁风雨或房租的华夏中，他也觉得自己十分重要，可以做许多大大小小的决策，很有成就感。对占据着这样一个社会位置的人而言，即使生了病，他也可以期待最好的医护复健，他承受着各方上司下属的关怀，生病反而更显出他的重要，因此生病就不是那么一件严重痛苦、会影响家人生计的事。

在另一方面，对一个早出晚归劳力劳心的工人而言，他的薪水有限，前途不稳，由于可掌握的资源太少，孩子的教养和前途都不看好，不常也不受人尊敬或重视，一旦生病，不但没有能力负担完善的医护，有时甚至危及全家人的生存。对这些弱势社会位置上的人而言，人生中常常经历的事情往往

形成重大的危机，他们对生老病死的态度也比较倾向宿命式的悲观。

从这个简单例子来看，所谓基本的、共有的人类经验只有在原始的、尚未分工的初民社会中才存在。一旦文明逐渐发展，社会益形分工，人与人之间存在着权力大小不平等的阶层关系时，人类的经验、感受或世界观也就有极大的差异了。

既然社会位置不同的人实际上过着极为不同的生活，有着非常不一样的经验与感受，更有极为不同的利益所在，那么，文学就应该为他们提供表达的管道，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找到对生活方式和感受的描述，能够更明确的建构出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观点。

可是，我们的社会却没有为弱勢位置上的人提供管道，让他们由自己的位置出发来看世界、看生活。相反的，我们的大众媒体充满了单一的说法。最近电视上不断出现一家报纸的宣传广告，以黑底白字宣告：「台湾人形遍天下，台湾的钱淹脚目……我们要做尊贵的世界公民」云云；这里所描述的经验及期望绝不是我们这些既没有机会环球旅行，也不可能坐拥大量金钱的人所能想要的。如果我们本地都已经不能有尊严的活着，不被社会看重，又如何做尊贵的世界公民？

再进一步来看，劳工的生活世界在我们的媒体、资讯、教育、文艺、娱乐中都没有得到适当的呈现。电视剧中描写的是中产的，都会的男女的爱；社会大众对劳工的印象和体认也多半止于「工人好吃懒做，破坏投资环境」；我们的教育制度虽然口头上说劳动神圣，却又不间断用升学主义来强调唯有读书高；我们没有几本描写劳工生活的小说，没有几部拍劳工的电影；连大众娱乐的场所也保留给有闲有钱的中产阶级。

在这样不利的社会条件下，劳工由媒体及资讯管道中所接受的价值观念和常识，有许多是对劳工本身不利的。比方说，目前台湾社会的共识之一就是投资环境恶化，而各方舆论也把责任归属给纷争不断的工人运动，好像为自身权益而抗争的工人应该为全台湾的经济困局肩负道义的责任。这种舆论——透过以资本主义发展为考量的学者以及为雇主代言的政客——充斥于我们的媒体中，不断地施加压力及罪恶感于劳工身上。

但是，这种对台湾社会的评估是有立场的。「投资环境」指的是「赚钱环境」，投资环境良好就是说老板可以用比较少的资本来赚大钱；也就是说，工人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所得。换句话说，学者所谓投资环境的「恶化」是相对雇主的利益而言，就工人来说，这种「恶化」正意味着工人权益的提高以及剥削程度的降低。就这样的角度而言，媒体及学者们对「投资环境」的「客观评估」完全没有考量到劳工的立场及利益。

此外，一般工厂常常用「管理」及「效率」等听来有点专业的名词，来教导劳工学习并执行新的劳动规范。为了方便生产程序和监督管理，工人一律在指定的空档时间去上厕所，为了配合机器设备以及生产线的安排，工人往往要站在一些十分麻烦的、不称手的位置，长时期维持一些可能伤害身体的姿势或动作。这样看来，所谓的效率与管理并不是什么客观中立的积极概念，而是为资本的运转及利润服务的。

凡此种种，都显示了我们周围常见的价值观念和常识往往是出于特殊考量的观点，而不一定代表工人的利益，有时甚至掩盖了劳工的利益。

从这方面来看，劳工文学创作有其重要的文化意义。透过对自身劳动生涯的描述与反省，透过对工厂的发展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的回顾，透过对劳工家庭关系及雇佣关系的权力分析，劳工及其子女可以逐步发展自己的利益观点，凝聚自己团结抗拒的声音，更可以间次发展出劳工对社会国家其他层面议题的立场，建立起自己的发言力量来表达劳工的利益。

文学创作不是中产都会知识分子有闲有钱有品味的专利消遣，它也应该是劳动者认识自身社会处境的一道之一。